

《逝去的年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逝去的年代》

13位ISBN编号：9789629506964

10位ISBN编号：9629506963

出版时间：1999

出版社：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作者：谢泳

页数：4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逝去的年代》

内容概要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逝去的年代》

作者简介

谢泳 男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

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学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

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

1995年起 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

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

1989年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8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1992年自费印刷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论文集 1996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著有《观察研究》一书，未出版（《逝去的年代》中收有主要部分）。

1996年后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前正在从事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工作。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逝去的年代》

精彩短评

- 1、不得不说，谢泳想要传达的的确是在这个集权政治之下这样一种自由思想的追求，也许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心理上的摧残和悲剧。而能够坚守理想又得到善终者，实在是少数
- 2、这些自杀者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夫妻双方自杀现象，计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等……夫妇共同自杀的现象表明：婚姻的良好状态都不足以缓解自杀者的压力，这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的恐怖程度。

章节试读

1、《逝去的年代》的笔记-第312页

吴宓1961年秋在广州谒陈寅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为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势，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化，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 it goes;

Whatever it goes, Chisen Says.

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金岳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收有林诒昌（北大毕业生，后到香港）1948年3月18日寄给胡适的一封信，信中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和对胡适寄予的厚望，林当时还没有毕业，是一个青年，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说明40年代末许多青年学生，是理解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他在信中说：

“先生应该知道：国家确需要你，希望你能为中国开创一个民主的传统，人民确需要你，希望你将民主精神播送给他们。在今天中国，你最有资格，因而也最有责任去开创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

（P141）

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P145

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基本上局限于著名的知识分子，这包括如下几类人物：作家，学者，知名演员和科学家。

西方国家和亚洲的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但在三十年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自杀，也是惊人的。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杀的情况，而中国作家自杀的传统是不常见的。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方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陈丹晨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这一时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压之外，对知识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在这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1949-1976年间，民间社会的根本消失，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知识分子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的，但1949年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完全消失了，这些权利的消失，使知识分子只能依赖体制生存，而一旦被体制排斥，他们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以上两种自由，他们的生产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之后的绝望也是由此而生。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另外，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身体以及身体加颜面上的双重打击）

这些自杀者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夫妻双方自杀现象，计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等。婚姻状况是研究自杀现象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都认为婚姻状况的恶化是导致自杀现象增多的一个原因。但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中夫妇同时自杀的现象恰好表明，这一时期的自杀人数激增完全是由于外在的社会压力而致，与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状况并无直接关系。夫妇共同自杀的现象表明：婚姻的良好状态都不足以缓解自杀者的压力，这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的恐怖程度。

《逝去的年代》

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他叫罗隆基。他的被遗忘，不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的政治生涯不够分量，难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而是因为他的经历涉及到对一个时代的整体评价，也就是说，在他和这个时代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他和这个时代最终发生了冲突，如果说他是对的，那么就是时代出了问题，如果时代是对的，那么就是罗隆基有了问题，不可能都是对的，也不可能都错了。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在时代和个人的评价不能统一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选择认同主流的态度，因为不能否定一个时代，同时也就不可能给予和这个时代发生冲突的个人以公正的历史评价。（P165）

P193四十年代，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罗隆基和“中社”的代表熊希龄、谷鍾秀、李璜一起质问汪精卫，国难会议为什么不谈政治？汪精卫竟然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你们不满意尽管革命好了”，罗隆基他们愤然而退。——这个很能说明当下政改的一些问题

闻一多那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卷进政治的漩涡中去。他正颜厉色地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史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协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罗隆基听了很不愉快。（梁实秋，《记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社，P104）

《逝去的年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